

从1997看中文神学教育

周郁晞

我们在一个变幻的世界里——你在变，我在变，大家都在变；不但自己在变，就是周遭的环境也在变。真是沧海桑田，变幻无穷！有些变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变；有些变是在我们觉察中变。有些变是无关痛痒，毫不重要；有些变却是石破天惊，激起强烈的冲力。

1997年香港的变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，反殖民地力量下，一种可知的变；它也是一种石破天惊，带来无穷冲力的变！从资本主义的英国，将政权移交给共产主义的中国！这强大的冲力带给香港居民迷惘，不安，有一种前途茫茫，不知何许的感觉。邓小平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，他提出一国二制的政策，为香港居民开了一条出路，希望香港居民，对于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，有充足的信心，渐渐消失恐惧的心理。

香港已跨入了一个伟大富于挑战性的时代。在五十年不变——保持现有的社会制度——的大前提下，香港的居民都有责任参与，塑造出光明的未来。基本法的制订，十分重要。我们希望制订出一套健全的民主制度。在制订的过程中，要注意二个重点：(1)争取最高度的自治；(2)教育群众(包括我自己在内)民主的运作。后者尤为重要，因为如果人民不知道怎样运作，被政客利用，其后果不堪设想，或许比极权政治更可怕。无可讳言的，这塑造的工作是艰巨的，需要一番努力的折冲樽俎，或许比在战场上，打一场硬战，更要艰难。不过只要大家同心，努力争取，香港的未来是光明的。

香港既然肯定的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，教会面对新的情势，

新的局面,新的挑战,就应当有新的计划,决定新的动向。这次学院交给我的,有关神学教育的课题,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我的看法。

在讨论或计划1997年后的神学教育,首先必需从基督教的信仰,周遭的情况,文化的因素,定下一个基本的原则,作为指引。以下所论的不过是这课题的第一炮,或许是第二炮,第三炮。……这都没有问题。紧要的是希望关心中文神学教育的人,多多检讨思考,有更多更好的意见发表,互相借镜。

(一) 神学基础

要谈神学教育,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它的神学基础。神学教育与人间世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风俗、语言息息相关。如果没有健全的神学基础,有很大的危险性。在神学上成为褂羊头,卖狗肉的神学——名为基督教神学,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神学。

神学有它的普世性,也有它的特殊性。普世性的神学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神学。特殊性的神学是带有泥土气息的本色化神学。适用于特殊地区。特殊性的神学必须以普世性的神学为出发点。换句话说,特殊神学乃是普世神学对特殊地区的情况,需要,挑战的回应。在讨论中文神学教育的时候,必须依据一种真实可靠,且有活泼生命的普世神学。

我们没有时间全面的讨论普世神学。不过有一点,在我们讨论中文神学教育中,有巨大影响的,不得不在这里摘要的说一下。

现代在神学上有一个极大的危险——福音宣告的两极化!有些神学家宣称他的神学是正统的,靠得住的基督教信仰:个人福音。另有些神学家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:社会福音。…只谈个人得救,忽略社会得救,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的得救;相同的,只谈社会得救,忽略个人得救,我怀疑他所称的得救的能效。十字架的信息是对付罪——个人和社会的。

一个得救重生,有生命的基督徒,憎恨一切罪恶。他必须,不能推辞,和非基督徒携手相将,努力铲除社会罪恶,并且应该比非基督徒做得更好。另一方面,热心改进社会,努力将非人性化的社会,改变为人性化的社会,没有错,这是上帝所给的使命。不过记住:这是片面的,尚有另一方面——对付个人的罪。片面的福音不是福音。

(二) 中国文化的全景

现在教会里的神学家尝试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挂钩的人,大多数都是依据一人或一家的学说,去撰写他们的神学;很少有人把中国文化的全景,作为他们的立场,去撰写他们的神学。譬如把人性论作一个例子:

有人从以前旧式学校的启蒙课本《三字经》里的第一句话:「人之初,性本善」,就以「人性本善」去组织他们的神学系统。「人性本善」原是孟子思想体系里的一种学说。孟子主张人的本性有四种善端:「恻隐之心」,「羞恶之心」,「辞让之心」,「是非之心」。

有人读了荀子的话:「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」,「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於犯分乱理,而归於暴」。他们就从这角度去撰写他们的神学。儒家学说,原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:(1)孟子的——如以上所说的,主张性本善;(2)荀子的——主张性本恶。荀子性恶的主张传给他的学生——韩非。韩非是法家,正可以把性恶的论调,作为法治的伦理基础。因为人性本恶,需要法治去保护人民的利益,社会的安宁。他认为人是自私的,「好利恶害」,所以必须「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」。性恶成了法家的思想。

更有人采取墨子的思想。墨子以为「人性如素丝」。有一天墨子在路上见到染丝者,就叹说:「染於苍则苍,染於黄则黄。所入者变,其色亦变。五入而已,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」他们就以人性乃是 tabula rasa (白板或白纸),善与恶

乃是以后写上去的,作为根据,去缀写他们的神学。

从人性来看,我们已见到中国文化,何等的博大洪深!

从基督教的信仰,去评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论,究竟那一种对——性善呢?性恶呢?性为 tabula rasa 呢?这是一种很有兴趣的尝试。

性善说——乃指原人而言。上帝造好了人以后,就赐福给他们,并且把管理这受造世界的重大责任,交给他们。「上帝看着这一切所造的,都甚好!」(创1:31)。

性恶说——乃指亚当与夏娃犯罪以后说的。加尔文(John Calvin)的「人性完全败坏」(Total Depravity)的教义,可以为人性本恶的最好诠释。

人性如素丝——只能从基督教教育立场上,说到人性的可塑性。浦希纳(Horace Bushnell)在其所著《基督徒的养育》(Christian Nurture)里说,「一个儿童在生长中,成为基督徒,别无其他。」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指出家庭教育的重要。一个基督徒的家庭,必须提供良好的环境,使儿童在基督教化的气氛中成长,在他们的品格上,烙上基督的印记。

华人的品格气质,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,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文化的环境里。许牧世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里,说他初到美国的时候,带了好几张廿四孝图,这些图,画得很美,有中国的情调,而且每一幅画,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他想到了美国以后,这些图画,一定很吃香。他可以一幅幅慢慢的卖出去,赚一点钱,作为生活上的补贴。谁知不如他本来的意料,无人问津,一幅都没有卖出去。究竟为什么呢?随便把「黄祥卧冰,孝感动天」。做个例子罢。那些自我主义较重的西方人,他们那里会相信,世界上有象黄祥一样的蠢汉,为着要满足重病中的爸爸,想要吃鱼的渴望,脱去衣服,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之下,赤了膊,卧在冰上,想把冰溶了,可以捉到活鱼,去侍奉爸爸。至于「孝感动天」更是莫名其妙了。他的那些廿四孝图,只好让它们卧在箱底里了。

一九四八年,我到美国去读书。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江贵云校长,深知我是怎样的一人,几次三番的叮咛我说:「周牧师,你在美国,千万不要说,「我不太会,我做得不好,我只知道一点点。」他们会误会你,真的不太会,做得不好,只知道一点点。」我切记着她的话,踏入波士顿大学的校门。有一天,我的同房同学问我,「Tim,明天的考试,你准备好了没有?」这个突如其来发词,把我记得很牢江校长的忠告都忘了,很快的说:「没有好好的准备。」你知道美国人的天性:乐意帮助人。他看见一个初踏美国土地的中国学生,考试没有把握,很想助我一臂之力。他说:「这位老师很是厉害的,你要我帮你的忙么?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可以推辞?我只得说,「好,谢谢你!」我们在一齐准备的时候,他惊奇的说,「呀,你准备的比我更好呢!」

华人与西方人士,居住在二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里,自然造成不同的气质。

中国的哲学思想,在春秋战国时代,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,到了汉武帝时代,儒家亚圣孟子的思想体系,差不多已整理出一套「六艺」或「六学」的理论。汉武帝赞助董仲舒的献策,「诸不在六艺之科,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。」自此以后,成为独霸天下的主流,渐渐成为空气。其它各种思想,不是不存在,不过只是中国文化的暗流,最重要的是道家及印度传入的佛学。

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前清的秀才,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儒家的学者。因此自小就听到许多儒家君子风度谦让的故事,如孔融让梨等的一类。那是吃饭坐的是八仙桌,一张桌子有四边,每边坐两个人。我的外祖父时时地教导我说,「在吃饭的时候,或是在宴会的席上,在你心里,要把桌上的每一碗菜,暗暗分为八份,你只可以吃那靠近你的那一份。如果靠近的,是上好的一份,那是你的运气;如果是最遭的,或是你所不喜欢的,那是你没有吃福。绝不可以眼睛张得很大,如空中的闪电,看见了一块你所喜欢的上好珍品,一双筷子,象天上的饿鹰,疾

驰飞下,捉住了放在自己的碗里。这是没有家教,缺乏君子风度,万万要不得的。」耳濡目染,我就在这种儒家气氛中长大的。也有很多自以为了不起,固执不化,踱方步的迂儒,自夸自己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嫡系,也因着被帝王利用,作为封建制度的基石,造成五四运动「打倒孔家店」的强烈反应。

在这里很有价值一提的,有两个名词:(甲)Indigenization——本色化;(乙)Contextualization——倡议这名词的人,没有给中文的名称。我把他译做「本地情景化」。我想这中文的名称,比原来的英文的名称更好,更能表达创议者的本意。

在神学界里,有好多的学者,都这样想:今天神学当务之急,倒不是解放神学(Liberation Theology),而是神学的解放(Liberation of Theology)。神学操纵在西方人的手中,尤其是德国人。有一位神学家,叹了一口气说,「唉,神学被困在条顿民族的牢狱里(Teutonic Imprisonment)！」这种呼声是正确的。因此,在神学界里,本色化的神学,锣鼓喧天,热闹非凡。可惜到今天还没有多大的成就。

黄彰辉博士是一位有思想,有学问的学者。他受的普通教育是第一流,学术水准很高的东京大学前身,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系。他的英文名字是Soki Coe。这里不是地方来谈他的名字。不过这倒是很有趣味的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。

当时他担任在英国伦敦为基地的「神学基金会」(Theological Fund)的总干事。他认为本色化神学这一名词,有很大的缺点。中国本色化可以指现在活生生的在今日的时代里活动着;但它也可以指现在已经过了时,置放在博物馆里,作为陈列品,供人欣赏。有些神学家在博物馆里,找到了那些中国文化的木乃伊,加上了神学的装饰,穿上了神学的衣袍,说这是道地的本色化神学。对于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,你有何话可说呢?

况且各地的华人,除了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之外,又掺杂了当地其他文化的因素。各地的华人,当然有中国文化的继续性,但也受了其他文化的影响,也有其非继续性的。因此神学如

果要对现时代说话,本地情景化的神学,比较本色化神学,就更合适了。

在讨论《从1997,看中文神学教育》这一个课题时,从中国文化的继续性,世界形势及思想的共同点来说,各地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镜的。但是从非继续性来看,我们不能希望有一套统一性的课程。各地还是要作出自己神学教育的研究。不过不论如何,在各地互异的中文神学教育之中却流着同一的中国文化的血液。

(三)共产主义世界的动向

自从戈巴卓夫(Mikhail Gorbachev)上台以后,在苏联民间,流传着两个字:Glasnost(开放)和Perestroika(改革)。这两个字,正是戈巴卓夫所走的路线。有好多人怀疑,他所走的路线,究竟可以走多远。

苏联在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,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全国19次代表大会,出席人数接近5,000人。这次会议,气氛活跃,争辩激烈,甚至指名道姓,要求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,苏共中央监委主席索络缅采夫等四人下台,也有800多位外国记者列席。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戈巴卓夫以党总书记的身分,作长达三小时半的主题报告。他开始说,如果苏共政治体制不加改革的话,社会主义必定走向死亡之路。在他结束时又说,要努力实施开放,给社会主义形成一个民主的形象。会议中通过了七项主要的提案:(1)戈巴卓夫的主题报告,(2)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,(3)反对官僚主义,(4)民族关系,(5)公开性,(6)法制改革,(7)具体实施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紧急措施。此次大会,也为戈巴卓夫明年四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铺路。这次代表大会,可以说是戈巴卓夫的开放和改革的胜利。虽然如此,在苏联国内,仍有一鼓庞大的保守势力,须有极大的冲力,才能突破。

共产国家中，有的对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箴默，有的却与以极高的赞扬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有一位中共副总理，赞扬此次代表大会，在开放和改革上，比中共更加迈进了一步。

戈巴卓夫让各共产国家，有其自主的权力，产生各自独特的色彩。

至于中共，赵紫扬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在胡耀邦下台以后，有人要把他推上党总书记的宝座，他极力推辞。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，不擅长理论。事实上，他果然是一个务实的专家，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理论家。

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，在北京召开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」，出席1936人。赵紫阳在他的报告中，提出了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」的理论，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。这是他与务实经验结合的理论。

第一，所谓辩证——不论是黑智儿的辩证也好，马恩列的辩证也好——都是一种动的和发展的哲学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，是建基於辩证的发展的基础上。在辩证的哲学基础上，没有教条主义及僵化思想的地位。一切的毛病，都是出在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上。四人邦的文化大革命，就是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所闯出来的灾祸。

(编者按：此篇乃周博士於1988年应三一神学院所邀而写的文章。内容方面有关共产主义的动向乃适合当时之情况。其他所分享的内容仍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。)